

也談「談判時代」

尹慶耀

「談判時代」的口號，是尼克森總統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就職典禮中正式提出的。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這個世界已處在談判時代之中。又不論它爲是爲非，但它業已成爲事實。因此，本文內容就重在分析而不重在批評。

尼克森總統目前的言行，已與其早年大不相同，那并不代表尼克森或美國反共立場的改變。換句話說，即使有所改變，那也是指方法并非指立場而言。在我們的記憶中，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在反共方面，有所謂圍堵政策、大量報復、彈性反應……等等，這些都和其全球戰略結合在一起。不過，美國獨霸核武器時，它不會利用來達成反共的政治目的，反而在「和平共處」氣氛中鬆弛其努力而將優勢喪失，當蘇聯在核子競賽中「趕上」或甚至在某些方面「超過」美國，核子僵局形成，大型戰爭顯然已非解決國際爭端的可行方案時，於是，人們想到以談判來代替對抗，說來也不足爲奇。

我們得承認，儘管美國的政策和作法有着不少缺點乃至錯誤，但戰後美國對外的軍經援助，對於若干地區或國家的經濟復興和阻遏共黨的入侵，確實有過不少貢獻。待到若干地區或國家在經濟上發展成「巨人」，在防衛上却不願担負責任，而美國本身又因過多地干預國際事務招致國內分裂，它要在大家分担世界防衛責任的構想基礎上轉變反共策略，實在也未可厚非。

從一九六九年到現在已經五個年頭，尼克森的第一任期終了，第二任期又將過去四分之一。就事論事，我們不能不說他的「以談判代替對抗」的願望，最多只實現了一半。那是說，談判開始了，對抗不曾結束。因此，我們對此一問題略加分析，依然有其必要。

但是，究竟什麼是「談判時代」呢？

也談「談判時代」

如果我們的瞭解不誤，尼克森的所謂「談判時代」，主要是指與敵對國家的談判而言。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日，他在國情咨文中談到他將來的「和平之旅」時說：「我到那裏去不存着幻想。我們有很大的歧見，我們將繼續有很大的歧見」。他希望去「談談這些歧見，而不是爲這些歧見去戰爭」。同年四月十四日，他在加拿大國會演說：「我們預料在很多方面，將繼續跟蘇聯和中共發生很深的理論與外交上的歧見」。算時間，那正是他訪問了北平之後和啓程赴莫斯科之前。在那兩次訪問之後，他把已經寫好的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又加以潤色和補充，於同年六月十一日殺青，交由「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發表。在此文章中，他曾警告說：「世人如將這兩次高階層會談中的任何一次，視作治療世界之病的萬應靈藥，便是一種謬誤，在國際事務方面凡是標明萬應靈藥的藥劑，每都含有毒藥」。如此說來，他的「和平之旅」又有什麼意義呢？他說：「誠如我對中國大陸人民所說的：『雖然我們無法拉合我們之間的鴻溝，我們也能設法架起橋樑，讓雙方可以走過橋來商談』。又如我對蘇聯人民所說的：『我們有時不免彼此競勝，但決不需要相互爲敵』」。從前引種種看來，尼克森并未忽視自由與共產是兩個世界，彼此的歧見是不易消除的。他似乎只希望依靠「搭橋」來「建立一種有效能而且可持久的和平結構。其中最重要的考慮乃是達成一系列的協定、諒解和慣例，凡是尋求變革的，可以憑藉這些協定、諒解和慣例，以和平的手段來從事」（同上引文章）。

當然，我們不能說尼克森的構想不够崇高，問題是共產世界的觀念是否和我們相同。

在我們的經驗中，同一個事物、同一名詞，在自由和共產兩個世界中，會有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解釋。

讓我們先談談和平與戰爭的概念。

尼克森在第二任就職（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日）演說中，宣稱「我們是站在世界的一個新和平時代的門檻」。他希望建立的是「能夠持久的和平結構」，「它不僅爲了我們的時代，而且也是爲了今後世世代代」。

在自由世界的概念中，和平與戰爭是不能並存的；在共產世界的辯證邏輯中，和平與戰爭却可矛盾統一起來。如果說自由世界把和平看作永久的或最終的目的，那麼共產世界是把和平看作暫時的或是一種過程。列寧說：「和平是爲了準備戰爭的一種暫息方式」①。毛澤東說：「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②。

其次，再談談兩種制度的「和平共處」。

在前節所引尼克森的文章中有這樣一些詞句：「假如這個世界的的生活方式要從對峙中解放出來，則美國與蘇聯及中共之間必須推演出新的關係」。「我們一方面追求此一目標，一方面也體認到共產領袖們對未來的打算也有了若干變化。不論他們過去所懷抱的是何種希望，可是資本主義國家會在馬克思主義教條的雲霧中崩潰的這種想法也已烟消雲散。其結果是他們已着手尋求與美國、與西歐以及與日漸強大而非削弱的自由亞洲的共存途徑」。不論這些話的正確性如何，但它似乎可代表自由世界對於兩個制度和和平共存的觀念。

可是，共產世界的概念又是如何呢？

高唱和平共處的黑魯曉夫曾經解釋說：「所謂和平共處，乃係在戰爭以外，利用一切手段，以繼續并加強鬥爭之謂」③。依照蘇聯現政權的解釋：「和平共處是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不但不排擠，而且爲解放鬥爭、人民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創造最有利的條件。它的目的在最大限度的動員力量來加強發展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消滅殖民主義殘餘，鞏固年青國家的獨立，推動它們的民族發展，促進爲爭取改造社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發展。并擴大其影響。……和平共處并不意味着衝突結束，而是意味着繼續發動衝突；并不意味着放棄革命，而是意味着繼續革命」④。

至於毛共，它雖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與蘇聯發生爭執，但它仍然不斷運用「和平共處」的鬥爭形式。它認爲「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共處政策，有利於孤立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勢力」。它不是反對「和平共處」策略，而只是反對「把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局限於和平共處」⑤。

復次，雙方對「談判」如何看法呢？

以會場代替戰場，以談判代替對抗，來尋求和平解決問題的途徑，或許是自由世界的新構想，問題是共黨是否也有同一想法呢？記得一九五九年三月七日黑魯曉夫曾在東德的來比錫發表演講，說明他對於國際會議的看法，他認爲共黨「參加這種會議的目的，不是爲了想要解決問題和爭端，而是要迫使對方承認你所已經獲得的東西，如有可能的話，就希望能獲得更多的東西」。當然，我們也不應當忘記毛澤東把談判當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他在延安作「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時這樣說，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中也這樣說，自從毛共轉變策略聯美制俄以來，不斷號召其黨員、幹部學習「關於重慶談判」的文件，直到最近仍然是這樣說。

看來，共黨的觀念是：在戰場上得不到的，設法在會場上得到；在對抗中失敗後，設法在談判中取勝。

最後，再談一談「妥協」的觀念。

目前自由世界正醉心「和解」，而和解的達成似乎需要讓步、妥協。其實，如果是迫不得已，共黨也講妥協，一九一八年列寧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即其一例。值得一提的是，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在毛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也提到妥協，他說：「我們應當指出，需要把蘇修、美帝的勾結、妥協，同革命的國家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的妥協區別開來。列寧說得好，『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於他的禍害，以便後來容易逮捕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爲的是要入夥分贓』（『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同帝國主義簽訂布列斯特條約，屬於前一種，列寧的叛徒黑魯曉夫、布里茲涅夫幹的是後一種」⑥。毛共當然自認爲它只能作前一種妥協，但蘇聯現今所作的是否後一種妥協，就頗有疑問

了。

以上所談，似乎有些抽象，有些理論化，但要和敵對方談判之前，瞭解一下對方的觀念，總不能算是一件壞事。

三

截至現在，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已有過多次談判的經驗（如果說得上是經驗的話），我們可以試着為共黨的談判策略勾劃出一個輪廓，或列舉出幾項要點，也許不是無益的。

一、創造形勢 共黨相信「形勢比人強」，但形勢是可以「創造」的，其方法是：（1）利用弱點——對方如果有弱點，不論其為心理的或是物理的，都是可以利用的。例如中國在八年對日抗戰之後，確已精疲力竭，人心厭戰，政府急於恢復社會安定，以重建殘破的經濟。當時毛共倡亂，政府也願順從民意，不惜容忍、讓步，以求和平解決。但毛共正如馬歇爾離華前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發表的聲明中所說：「……國民大會已經採取了一部民主的憲法……而不幸的是……中國共產黨竟認為它們不適宜參加國民大會，而這個憲法……好像已經包括了他們所要求的各主要之點」。又說：「共產黨是不惜採取過激的方法，以期達成其目的，舉例說吧，為了破壞中國的經濟，俾能產生一種情勢以便於他們推翻或促使政府的崩潰，共產黨竟悍然毀壞一切交通，對人民所受到的直接的苦痛，絲毫不予措意」⑦。又如美國因長期介入越戰，以致本身有財政赤字、輿論分裂、青年厭戰等等困難，遂也曾被共黨充分利用。那已是盡人皆知的近事，茲不贅述。（2）製造輿論——毛澤東在他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開放社會、新聞自由，是民主社會的瑰寶，但也往往被共黨所利用。而共黨世界中，不會有任何報章雜誌的言論，自陷其政府於不利。過去，自由世界對於越戰的報導，不少是有利於共黨的。一九六七年五月由共黨操縱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譴責美國「侵略」越南的「國際戰犯法庭」，由已故英國哲學家、數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任名譽主席，而宣判美國有罪，認定澳、紐及南韓為幫兇。其後不久，以反越戰為中心的學潮迅速侵襲了世界各地，這些都是製造輿論的手法。（3）孤立對方——

製造輿論的主要目的就在孤立對方。但除此以外，自由世界的多黨制度，也往往是共黨施行統戰的良好園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國若干所謂民主黨派合組「民主同盟」，它們并非共黨，但在幫助共黨孤立政府方面，確有過不少「功勞」。正是由於多黨政治的觀念，西方國家時或在處於反共第一線的國家中扶植反對黨，結果常是破壞了社會安定，打擊了領導核心，而使其政府陷於孤立。當對方的弱點被擴大，在輿論方面陷於不利，在形勢上又處於孤立時，共黨就在談判中居於優勢了。

二、藉故拖延 主張和共黨談判的人士，往往以「現實」「耐心」為詞，但實際上在這兩方面，他們都不容易勝過共黨。共黨如何作法呢？（1）利用講壇——共黨參加談判，不是為了解決問題，却時常利用會場作講壇，從事無盡無休的宣傳和謾罵。曾任韓戰時聯軍統帥的克拉克（Mark W. Clark）將軍說：「共產黨的談判人員根本不管他所說的話是前後一致。南日也不例外。我們可以偶爾使他為難，但是我們絕不能用論證或邏輯來折服他」。「在談判最初的時期，有一次卓伊（Admiral C. Turner Joy）將軍直接詢問南日一個問題，南日坐着不聲不響足有兩小時十一分鐘之久。那裏沒有議長警告違反規則，所以該會議室絕對靜寂至一百三十一分鐘之久」。「從我在歐洲與共黨相處所得的經驗，我知道假若我們回到板門店一天又一天的坐着聽他們的宣傳、謊言、及歪曲的事實，則他們會認為這是我們力弱的表示。這種每日對侮辱、傲慢、及謾罵的忍受，祇有加強共產黨的信心，認為我們在韓國希望停戰之心急切，最後必會屈膝……」⑧。共黨把每次談判都弄成馬拉松式，目的就在打擊對方聲望，消磨對方士氣，耗盡對方耐心，而使其急於以讓步求妥協。（2）節外生枝——可是你讓步也未必就能立即獲得妥協。克拉克將軍在回憶他在歐洲和共黨打交道時為道：「：康涅夫元帥在維也納笑着告訴我，假如我在一天接受所有他的可笑要求，第二天他會對我提出十個新的要求」⑨。關於共黨的此項戰術，中國人當不陌生。一九四四年毛共與政府代表在西安商談，毛共的要求，愈談愈高。毛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與政府代表王世杰等會談中，提出十七條，其內容和過去兩次要求，還相差不了。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然提出毛共「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十二條，把以往歷次商談的內容，幾乎完全推翻。新條件層出不窮，而共黨永遠會把責任推向對方，指責對方

缺乏誠意。(3)爭取時間——條件愈來愈高，使對方除非甘願完全屈膝，否則無法接受，自然就會拖長談判，爭取時間。共黨如此作法，其目的不外：(A)促使對方疲勞厭倦，失去理智，在行動上犯錯誤；(B)靜待對方內部分裂，使其在談判時失去後盾而被迫妥協；(C)在政治戰、宣傳戰、射擊戰上，爭取由劣勢轉向優勢。鮑斯卡倫在著書中說過：「共黨軍隊雖有蘇聯的軍事援助和顧問，但是，裝備和訓練兩俱良好的中國國軍，在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和初夏，仍然贏得多次重要的勝利。正如其一向的慣技，這些共產黨徒，當他們被擊退的時候，便要求馬歇爾將軍再度實施停戰協定」^⑩。其後，毛共不斷獲得蘇聯援助，而美國則對中國政府撤援，當形勢逆轉時，共黨當然不再理會什麼停戰協定了。以後，不論是朝鮮半島還是中南半島，或是其他什麼地區，一有機會，共黨這套舊把戲，就又當作新伎倆反覆運用了。

三、兩手策略 一九七一年七月，華盛頓和北平同時發表尼克森將赴平訪問的消息，那預示雙方的「談判」行將開始。同年第九期的毛共「紅旗」雜誌上，刊載了「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員會寫作小組」的文章「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其中說：「爲了打破敵人的反革命兩面政策，我們也必須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在堅持以武裝鬥爭行式的同時，又同敵人在多方面展開各種形式的鬥爭。各種靈活的鬥爭藝術，是無產階級對敵鬥爭的需要」。其實，所謂兩面或兩手政策，只有共黨長於此道，自由世界是不太內行的。例如：(1)又聯合又鬥爭——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五日毛澤東在「論政策」^⑪中，解釋「革命的統一戰線」，「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上引「紅旗」的文章說：「又聯合又鬥爭，兩者辯證統一的關係」。在形式邏輯的矛盾律中，沒有這樣的統一；而辯證邏輯的矛盾律（即矛盾統一法則）中，才有對立物的統一。假如非共黨人士要和共黨聯合，那就是聯合而不是鬥爭，可是共黨却既和你聯合又和你鬥爭，就可在統一戰線中，「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這不是老生常談，今年八月，周恩來在毛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中，還在以別一種方式，抨擊陳獨秀的「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王明的「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左傾機會主義。可是，這和談判有什麼關係呢？有的。共黨經常是把會場內

和會場外的鬥爭互相聯繫配合的。如果你在會場外被孤立，那就意味着你在會場內也將被孤立。(2)偽裝迂迴——共黨善於偽裝是盡人皆知的，另一項值得提起的策略是，共黨有所走的道路是彎曲的，而所指目標卻直是筆直的，它不過是在迂迴前進。這也可以引毛澤東自己的話爲證：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他在延安（毛共）幹部會議上講話時，曾經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我們說，我們不是『文化團體』，我們有軍隊，是『武化團體』」。「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鬥爭」^⑫。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動身前往重慶參加談判的前兩天，他寫過一篇「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說明毛共所以要參加談判，是因為國民黨「較之過去加強了它的地位」。共黨「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沒有這種讓步，就「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平局面」。「但不論何時，又團結，又鬥爭，……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項原則，必須堅持，不可忘記」。「通知」中有兩句警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其原文是：「但是你們絕對不要依靠談判，……必須依靠自己手裏的力量」^⑬。由這些話看來，毛共參加談判是別有動機，並不是真正爲了和平解決問題。毛澤東到達重慶後，在四十一天之內，政府代表與毛共代表舉行了五次會談，簽署了於十月十日發表的「會談紀要」。毛澤東於離重慶返延安的前夕（八日），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爲他舉行的一次歡送會上發表演說，根據當時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十月九日的報導，毛澤東當時曾經說：「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爲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國共兩黨與各黨各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一切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毛澤東返回延安，於十月十七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坦率告訴其幹部說：「紙上的東西並不等於現實的東西」。「我們的方針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如果他們要打，就把他們徹底消滅」。既然如此，毛澤東爲什麼還要到重慶去談判，並且偽裝和平讓步呢？他的解釋是：「『針鋒相對』，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從前不去是對的，這次去也是對的，都是針

鋒相對」。「有些同志問，爲什麼要讓出八個解放區？……：……在這一點上我們採取讓步，就有利於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取得國內外廣大中間份子的同情」。「世界上沒有直路，要準備走曲折的路，不要貪便宜」^⑭。這是說，共黨自己力量不濟時，須要走走彎路。（3）伺機質變——談判如果是指由戰場走向會場，那麼必須注意共黨在戰場上決不會停止行動。換句話說，他們是談談打打，邊談邊打，不利時談，有利時打，以打支持談，以談掩護打。當年毛共的宣傳部長王若飛，曾把毛澤東對高級幹部的講話摘要記在他的日記內，其中有一段說：「我們跟國民黨談和是表面的，不管是和他們訂下什麼協定和條款，它對共產黨人來說都不需要去遵守。我們決定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的方針是不變的。我黨我軍正準備一切，……爲着緩和敵人的進攻，必須爭取時間，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孤立好戰份子。和是我們的手段，打才是我黨真正的目的。把我們的力量滲進去，使敵人自行分化和瓦解……」。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周恩來在批判劉少奇時，也提到「重慶談判」的往事。他說：「我參加了舊政協，在舊政協開會以後回到延安向毛××匯報。毛××說的很清楚。毛××說這個和平我們是拖延時間，便於我們積蓄力量，便於我們訓練軍隊。我們一方面訓練軍隊，另一方面搞好生產，第三方面要加緊土地革命，準備戰爭，這個精神就把問題說穿了嘛！毛××還指示可以在政協決議上簽字，表面上說這個政協決議還不錯……」。說它不錯，不必履行，那正和簽了協定不必遵守一樣。從王、周二轉述的毛澤東的談話中，可以清楚地顯示出共黨是在利用和平談判，來準備下一次戰爭，由量變達到質變。假如它蓄積了足可推翻政府或吞噬對方的政治或軍事力量，它會毫不遲疑地改變它的態度與策略，隨時可以收起笑臉而伸出鐵拳。

有了協定，政府必須遵守，共黨即可隨時撕毀它而把破壞責任加諸對方。共黨能夠遵守協定的機會太少，眼前越南的停火協定，不就是活生生的例證嗎？不過，儘管共黨「真正的目的」是「打」，它也會把「好戰」頭銜、挑發「內戰」的責任誘諸對方。這樣做，是使自己在輿論上爭取同情，在行動上掌握主動，收到毛澤東所謂「有理、有利、有節」^⑮的效果。其實，所謂「有理、有利、有節」，就是在量變質變過程中，靈活運用，隨機應變，其要求目標也伴隨着本身力量的增長而水漲船高。一九三四年毛共竄抵陝北時，業已潰不成軍。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毛共即曾通電「停戰議和」。

也談「談判時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九月二十二日毛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提出四項諾言向政府輸誠^⑯。一九四〇年一月，共黨實力漸增，毛澤東乃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妄談什麼新三民主義、舊三民主義……：……高喊「有飯大家吃」。甚至叫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一文時，自稱共黨領導的，「包括十九個大的解放區」，既然它乘政府軍抗戰之際，無限制地私自擴充了實力，它的要求也就和局促在延安一隅時不同了。等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共竊踞大陸的形勢已成，毛澤東紀念其建黨二十八週年的文章，就標題爲「論人民民主專政」，再不要什麼聯合政府了！

大陸淪陷前整個和平談判以及美國的調處，事實上只爲毛共爭取了它奪取大陸的時間。這一慘痛史實，誰能保證它不重演於今後的世界？

四

撇開理論和原則不談，讓我們來略爲檢討一下當前自由世界在談判時代的得失。

先談西德罷。過去的豪爾斯坦原則（Hallstein doktrin）^⑱早經放棄，自從布朗德入閣後，就積極推動「東向政策」^⑲。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在莫斯科與蘇聯簽署德蘇條約，十二月七日在華沙與波蘭簽署德波條約，這兩項條約使戰後的歐洲邊界固定下來，在西德說來，是接受了喪失領土的事實，在蘇波說來，那正是黑魯曉夫所說迫使對方承認你所已經獲得的東西。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又在柏林與東德簽署基本條約，規定東西德「以平等的權利爲基礎，發展彼此間的正常關係及睦鄰關係」（第一條），而且互相尊重「國家主權平等、尊重其獨立、自治及領土完整」（第二條）。雖然西德并未宣佈承認東德爲國際法上有主權的獨立國家，因而部分學者解釋此乃依據新國內法的承認，並非一般國際法的應用，但學理上的爭辯無礙於分裂事實的固定化。自從東西德基本條約簽訂後，承認東德的國家迅速增加，而今年的二十八屆聯大中，東西德已同時入會。這顯示，東德的地位因談判而提高了。至於西德不見得有同樣收穫，最近它與捷克的談判，且因柏林地位問題而觸礁。

南北韓於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發表「共同聲明」後，雙方的和平談判即

已開始。我們相信南韓是改變反共策略而非放棄反共立場，或許是不以射擊戰爭勝負，而以外交戰見高低。但如果說南韓主要目的在維持現狀，則北韓的主要目的在改變現狀，最重要的是迫使美軍撤出韓國。當前的事實是，今年五月十九日，北韓已加入作為聯合國機構的世界衛生組織（WHO），七月二十四日又被聯合國貿易與開發會議（UNCTAD）接納為第一四四名會員國²⁰。聯合國的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行將結束²¹，這些都可看作為北韓進入聯合國鋪路。今年六月二十三日韓國總統朴正熙氏發表特別聲明，其中謂聯合國半數以上會員國如同意，並在不妨害南北統一之前提下，不反對北韓加入聯合國或與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惟北韓主席金日成亦於同日利用平壤市民歡迎捷克黨政代表團大會發表演說，聲音應在單一國號下實行南北聯邦制，國號定為「高麗聯邦共和國」，在此國號下作為一個國家加入聯合國，而拒絕分別各自入會。姑不論其本意實質如何（目標或許仍是逼走美軍），但其氣焰高漲的事實是不容忽視的。

中南半島的和平談判，也是最近的新鮮事例。自從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越南停火協定生效後，北越與越共（南解）違反停火事件數以萬計，加拿大代表因不能執行任務憤而退出國際監管委員會。此外，毛共將武器彈藥運入東河，北越在南越境內增建了十二處空軍機場，而越共正積極籌建第三個越南。其實，人們時常忽略，巴黎和談允許越共參加，就無異默認了它的地位，如今它已從無到有，獲得三十幾個國家或政權的承認，如果不是有所謂談判，它單憑戰場上的戰績，這些是不容易得到手的。

談到寮國，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的日內瓦協定，並未能真正保障它的中立，事實上它正不斷遭受共黨的侵凌。後來為了配合越南的停火，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永珍的和平談判即已開始。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寮國政府和寮共簽署停火協定，但寮共的要求節節升高，經過七個月的談判，最近才達成一項成立聯合政府的協議。依據外電報導，這個聯合政府仍由佛瑪擔任總理，而由其異母弟寮共首領蘇法努旺和另一位由永珍派出的人士分任副總理。內閣中十二位部長，寮共據有外交、經濟與計劃、公共工程、宗教、宣傳與新聞五部，政府人士保有國防、財政、教育、內政與衛生五部，另外的司法與郵電部，則由社會賢達出任。共黨對它的五部尤其是外交、宣傳與新聞部，是頗善於運用的。國防與管理警察的內政部，自也頗為重要，但據傳寮

共已控制寮國九、一〇〇平方哩土地的百分之八十，和全國近三〇〇萬人口的約三分之一。而寮共可派軍警一、五〇〇名駐於永珍，另派八五〇名駐於皇都鑾巴拉邦。寮國皇家軍警亦將派出相同人數，分駐於上述兩城市，但超出上述人數的軍警，須要撤出。那麼，國防部和內政部的地位與職權，也就被削弱得可以了。協議規定成立諮商性質的政治混合委員會，由政府和各派十六人連同中立份子十人組成。該委員會設主席一人，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一人，第二副主席一人。寮共要佔有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政府所得者僅為第二副主席，因此建議增設副秘書長一人，以示公平，但為寮共所反對²²。由上述種種看來，寮共實已兵不血刃而進入兩都。此外，近二百名的美國軍事專家與顧問，以及由美國供應經費的數約一萬七千名泰國傭兵，將於六十天內離開寮國，但約四萬名的北越軍隊，是否會真的從寮國撤離呢？一般人認為高棉的安危，關係着整個中南半島的前途。據悉尼克森總統為了「拯救高棉」，美機不僅準備繼續而且定要加強轟炸高棉的共軍，可是受了水門事件的影響，終於不得不與國會妥協，於八月十四日夜下令停炸²³。我們得承認，蘇聯的核子武器和攻勢海軍，都是在「和平共處」口號掩護下成立的。一九七二年五月尼克森訪蘇時與蘇聯簽訂的限制戰略攻擊武器臨時協定，美國在飛彈數量上是吃了虧的，因為當時美國在技術上領先蘇聯，還可以勉強拉平。及至蘇聯的多彈頭飛彈試驗成功，在質、量雙方都有領先的趨勢時，於是美國又被迫要在武器管制談判中改變策略，而要求蘇聯減少其飛彈發射器的數量了。

近來，人們似乎過多地強調蘇聯的「西守東攻」政策，西歐之與蘇聯「和解」，多少也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基礎上。可是，正當人們集中注意蘇聯增兵中蘇邊境時，它也悄悄地加強了在歐洲的兵力部署²⁴，這不由得使我們想起英國「情報文摘」的一項警告：一味認為毛共是對蘇聯的一種嚇阻因素的想法，將是非常危險的²⁵。可是，所謂談判時代，是否正以此為出發點呢？早在一九六六年時，北越的國防部長武元甲就曾對法國「世界報」記者說：「假使我們不能在戰場上取勝，那麼我們也還是在華盛頓和其他美國城市的街頭上去贏得勝利」²⁶。共黨在會場上不能取勝時，是否也可求助於對方國內呢？自由世界的政黨分歧、府會對立、水門事件等等，事實上都在削弱自己的談判地位。如果我們說，美國有資格倡導「談判時代」，并

非由於其崇高的和平理想，而是由於其強大的軍事與經濟力量，想來也不為過。那麼，任何足以削弱本身力量的行動，都將使自己在談判中失敗。

一九七三年五月三日尼克森總統向國會提出的外交政策報告的總結部分說：「和解並非意味着危險的終結。……過早地認為危險已告消逝，是最危險不過的事」。

這位「談判時代」倡導人的話是語重心長的，你沒聽到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克里孟茲關於北越、北韓正積極備戰的警告嗎？

註①：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列寧在俄國共產黨（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

註②：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發表的「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八七至三二五頁。

註③：一九五九年十月黑魯曉夫參加北平政權十週年紀念，返國途中在西伯利亞演說時語。

註④：一九六九年一月廿九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談話「中共的對外政策」第九篇。蘇共現仍再三重彈此調。

註⑤：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刊載「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同年七月廿日重刊。

註⑥：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新華社」北平電。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係於八月二十八日經大會通過。

註⑦：轉引自劉光炎譯鮑斯卡倫（Anthony T. Bouscaren）原著「共產帝國主義」，國立編譯館版（世界書局印行），四五頁。

註⑧：克拉克將軍著「從多瑙河到鴨綠江（From the Danube to the Yalu）」，一九五四年出版。本文所引係根據國防部聯合戰研究督導委員會中譯本譯文，見該書九二至九四頁。南日為北韓在板門店談判的首席代表，卓伊為美方首席代表。

註⑨：同右，一三頁。康涅夫（Marshal I. S. Konev）為第二次大戰後蘇聯駐奧地利高級專員，其時克拉克將軍為美國駐奧高級專員。

註⑩：同註七，四三頁。

註⑪：該文收入「毛選」二卷，七五九至七六七頁。

註⑫：該次談話，標題為「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收

也談「談判時代」

進「毛選」四卷，一一三至一一三六頁。

註⑬：該「通知」亦收進「毛選」四卷，一一五一至一一五四頁。

註⑭：「關於重慶談判」載「毛選」四卷，一一五四至一一六四頁。

註⑮：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澤東發表的「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語，詳見「毛選」二卷，七四四頁。

註⑯：毛共四項諾言為：（1）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2）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3）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4）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註⑰：「毛選」四卷中，此四語似已從「新民主主義論」中刪除，惟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依然存在。見「毛選」四卷，七四四頁。

註⑱：豪爾斯坦（Walter Hallstein）為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的西德外交部副部長，他所主張的原則是凡與東德建交者，西德即不與其保持外交關係（惟蘇聯除外）。

註⑲：布朗德為社民黨黨魁。一九六六年任副總理兼外長，即倡「東向政策」，一九六九年組閣後，更積極予以推行。

註⑳：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法新社」日內瓦電。

註㉑：同年九月七日「合眾國際社」漢城電。按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與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作為監督朝鮮半島經由大選進而統一的機構，惟北韓從未承認委員會的權威。

註㉒：參閱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星島日報第二版載「美聯社」永珍十二日電及十四日中央日報第二版載該報駐高察記者盧偉林高察通訊「寮局前途不容樂觀」。

註㉓：參閱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Foreign Report」。

註㉔：同年九月十七日中央社倫敦「合眾國際電」。

註㉕：參閱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第二版字聲取材於八月份英國「情報文摘」的「西歐的危機及其自救之道」一文。

註㉖：一九七一年十月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雜誌載英國名軍事評論家 Major E. Hinterhoff 著「越南的現況與前瞻」。

註㉗：請參閱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央日報第二版刊載之「美聯社」東京十七日電訊。